

扩大还是缩小?

收入差距在过去25年日益扩大，并未像我们当初预计的那样减小

布兰科·米莱诺维奇





收入差距在扩大。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近几年，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亦有所扩大。全球金融危机使发达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增长陷于停滞，但亦有可能缩小全球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大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有人认为，只要市场机制能有效运行，抑或每个人的收入都有所增加，收入差距即无关紧要；其他人则认为，收入差距会抑制经济增长，而人类道义也仅仅容许有限差距的存在。

收入差距的衡量

如何衡量收入差距？人们习惯与邻居、同事或朋友比较各自的经济状况——比住房条件、财物多少。经济学家通常以家庭调查作为衡量收入差异的手段。这类调查跨度较大——通过对境况各异的大量家庭的访谈，确定其不同的收入来源（货币及实物）和消费结构。其具体方法是：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减去各种直接税负（这一差值也可以用家庭总消费来替换），再除以家庭成员数；随后，将所有个人按家庭人均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列。由此，我们得以计算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基尼系数”（见专栏1）。

家庭调查虽是衡量收入及其差异的最有效手段，却非至善之策。问题在于，收入金字塔的顶端可能被“削低”——真正的富人要么拒绝接受此类调查，要么刻意隐瞒自己的收入。由于家庭调查的

保密性，他们如此回避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对“顶端削低”说法的质疑促使学界改用财政数据，即用富人税前上报的收入来估算最富裕的1%（或0.1%）的个人的收入比重。大家最初设想：与家庭调查人员相比，富人们更难逃避税务部门的统计，并且对后者更有可能讲真话。可在美国，虽然家庭调查以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为对象，财政数据则集中考察位于该体系顶端的富人，但基于两者所得出的结果（Burkhauser等，2009年）其实差别不大。

利或弊？

近年来，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抑或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公平和效率”）。但经济学界以往坚持的主流观点恰恰与之相反——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上述转变的主因在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以实物资本为主的年代，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因；由于富人可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及随后的实物资本投资，他们的人数在当时的确多多益善。

但由于人力资本比机器设备更稀缺，普及教育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社会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时，教育普及才有望实现。教育普及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前者不但需要后者，而且有助于实现后者，因为前者缩小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因此，经济学界如今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批评得更多。该问题的缓解既有其实践意义——推动经济增长，又

有其道德意义——缩小男女之间、一国不同地区居民之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过去 25 年见证了相互矛盾的变化：一方面，多种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各国国内）；另一方面，其他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日益扩大，抑或徘徊在高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 年）。这与人们预测收入差距时最常用到的两个理论——库兹涅茨曲线和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定理（见专栏 2）时常相悖。

最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等拥有最丰富的长期经济数据的国家）的收入差距起初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先升后降（这不足为奇，毕竟库兹涅茨当年即根据该现象提出自己的假说）。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收入差距在扩大到极限后出现大幅度、持续缩小，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触底。

但从那时起，在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大多数最发达经济体，社会财富显著增加，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2010 年，美国实际人均收入比 20 世纪 80 年代增长 65%，英国则增长 77%。但在同时期，美国的国民收入差距却日益扩大，基尼系数从 30 上升至 40，甚至更高（见图 1）；英国则从 30 上升至 37。这反映出收入分配中存在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总体而言，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05 年和 2006 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 20 个富裕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发达经济体国民平均收入的日益增加，国民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假如库兹涅茨能看到

专栏 1

基尼系数探秘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最常用指标。理论上讲，假如所有社会成员收入相同，该系数即为 0；假如全部社会收入皆被一人获得，该系数则为 100（或 1）。

基尼系数何时可算作“正常”、“寻常”与“可为人接受”？瑞典、加拿大等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国家的基尼系数为 25—35；而大多数国家则在 40 左右。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在 40 至 46 之间。多数非洲和拉美国家为 50—59，极端情况下则为 60—63。目前，尚未有国家被确认持续超过非洲与拉美的极端水平。因此，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实际范围为 25 至 60 左右。而全球基尼系数（全球居民收入差距）则超出该范围，几乎为 70（见图 1）。

这一切，必定会像许多经济学家那样深感不可思议。

在中国，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在这个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2008 年对外贸易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60%——过去则仅为 20% 左右。根据 HOS 定理，由于低端工人工资的相对上涨，社会收入差距会缩小。但实际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 1980 年的 30 上升至如今的 45。这一次，事实再次有力地冲击了理论。

富裕国家变得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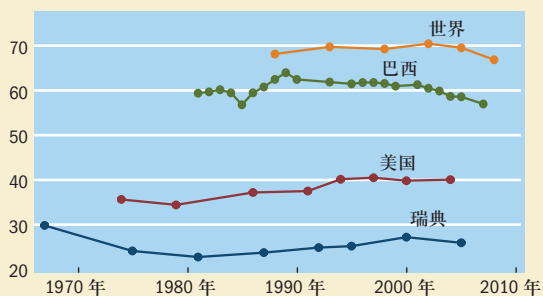
收入差距缘何而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的技术变革使对学历较高劳动者的需求升温，致使国民收入差距再次扩大。当前社会无法足量供应新型经济所需的上述劳动者，导致这些人的收入——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有所上涨。已故荷兰经济学家（也是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曾指出，收入差距是技术与教育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虽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让低技能劳动者尝到甜头，但随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及其需求却使风水再次转向高技能劳动者。

美国学者高丁和凯茨（2008 年）通过研究则发现，在过去 30 年，高技能劳动者的入职条件已相对固定——其平均在校教育时间刚好超过 12 年。两位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假如说上述观点有些套套逻辑，那它貌似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衡量高技能劳动者受益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只能通过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图 1
全球收入差距

全球居民的收入差距比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还要悬殊。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美国和瑞典的数据援引自卢森堡收入调查数据库；巴西的数据援引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库（SEDLAC）；全球数据援引自米莱诺维奇的著作（即将出版）。2008 年的全球基尼系数则是一个初步估计值。

注：图中各项基尼系数均计算自可支配收入。

加以推断。但某种完全不相关的因素（例如工会力量的削弱）或许是上述差距扩大的实际动因。

一国的制度框架也是确定收入差距水平的重要因素。政府可通过提高税收、增加社会转移支付，对高技能劳动者相对多出的部分收入进行再分配。欧洲大陆国家推行了更为积极的再分配政策，因此其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远低于美英等国（Piketty 和 Saez，2006年）。例如，在2005年，得益于社会转移支付（不包括国家养老金）和直接税收，德国的基尼系数降低了9，而美国同期仅降低6。

一国政府拒绝采取措施来最大程度地减小收入差距，或是基于如下观点：收入再分配会导致资源浪费，并削弱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种观点成为另一种说法的佐证，即收入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取舍关系）。但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不作为或许折射出一种政治现状：由于政治热情更高、对政界精英支持更有力，富裕阶层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较其他阶层偏大。

最新的、关于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模型则是基于如下假设：“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投票人”——其政治取向会以某种方式使某种决策产生相应倾斜——比“收入居中的投票人”要富裕得多。因此，政治决策将更符合富人的政治取向。基于这种分析，政治体系的游

戏规则已从传统的“一人一票”逐步转向“一元一票”（Karabarounis，2011年）。

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种解释是社会规范的不断改变。以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工薪资的巨大差距为例，社会各界曾对此颇有微词，如今却似乎很包容，甚至予以鼓励（Levy 和 Temin，2007年）。收入差距扩大虽已被各种数据所证明，但我们很难确定这是何种社会规范改变的结果，以及致其改变的原因。

亦有人将富裕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归咎于全球化。高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生产呈现专业化趋势，导致高、低技能工人薪资差距拉大。廉价的低端进口产品和外包业务也致使较低、一般技能劳动者薪资水平下降，亦或失业——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针对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述四种解释——技术进步、政策变化、社会规范改变和全球化或许都有道理。但即便技术进步、全球化等非人为因素被视作问题的主因，政府干预仍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

新兴市场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新兴市场国家亦不例外。作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开放的大国，美国可谓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典型案例。而在与美国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中国，亦出现类似的情况。中国曾（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穷国，20世纪80年代才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转向高度参与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贫困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因此该国当时的基尼系数低于30。随着1978年以来经济的逐步增长，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各行各业都

专栏2

相关理论

20世纪5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库兹涅茨曲线”：在前工业化社会，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同样的贫困中，因此收入差距极小；随着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人们的平均工资增加、薪资差异拉大；再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社会富裕水平提高，城乡差距会缩小，而养老金、失业保险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转移支付将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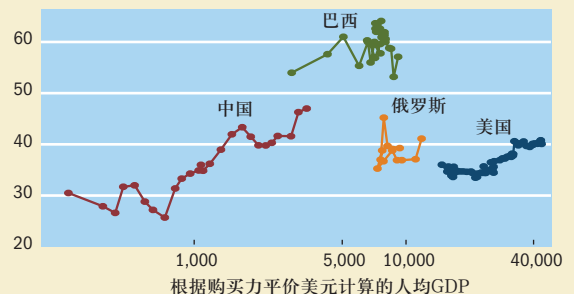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是总结自国际贸易的理论。根据该定理，随着贫困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程度加深，它们会逐渐实现商品生产的专门化——生产它们拥有某种比较优势的低端产品；如此一来，该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进而使这些劳动者的薪资出现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上涨；此时若以高、低技能劳动者的薪资比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该国的国民收入差距即显示缩小迹象。而在富裕国家，情况则完全相反：由于它们出口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国民收入差距将有所扩大。

图2

令人费解的曲线

在多数国家，收入差距都有所扩大，唯独巴西例外——该国收入差距最终出现符合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的缩小迹象。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

注：中国（1964—2005年），美国（1950—2008年），巴西（1960—2007年），俄罗斯（1992—2005年）。

有所体现，基尼系数现已超过美国（见图2）。如今，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3:1（印度则为2:1）；起步基础较好的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发展更快，导致区域差距拉大；薪资差距也急剧扩大。同时，私有财产和企业家收入——这是中国分配最不平等的部分收入，也是改革开放前并不存在的东西——却成为更具分量的因素。

但中国迄今的发展历程符合经典的库兹涅茨曲线：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内收入差距会扩大。该国的发展如仍遵循库氏曲线，其国民收入差距在随后阶段必将缩小。如果中国政府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泽及更多人（而不仅限于国有部门），或引入失业保险机制，甚至制定农村就业规划——正如印度近年所推行的政策那样，上述情形或将实现；如果中国沿海地区的繁

造成全球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还有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

荣能够自然扩展到中、西部地区，上述情形亦有望实现。收入不平等并非纯客观因素所致；若社会容许，该问题即会加剧；如政府主动推行相关政策，该问题亦能得到控制。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急速过渡

除了少数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差距都曾急剧扩大。自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差距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1980—199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年均上升1/300；而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中，俄罗斯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是前者的三倍。与此同时，俄罗斯国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却有所下降——时常出人意料地骤降，导致该国贫困人口激增。

前苏联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原国有财产被特权阶层（政治寡头）在私有化进程中纳为已有，致使国有部门职工严重分化——在业者、暴发户、失业者、收入剧减者（Milanovic 和 Ersado，即将出版）。以往由国有企业支撑的社会福利网络也瓦解了。到20世纪末，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不再扩大；自那时起，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差距略甚于美国，与中国基本持平。

虽不像俄罗斯那样明显，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亦有所扩大。在一些中欧国家（如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即使用现有市场经济的标准加以衡量，其收入差距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过渡阶段采取了更具平等主义色彩

的收入分配政策，即使经历各种剧变，亦未使它们的收入差距远离在欧洲大陆被视为正常的标准。

拉美：一切皆有例外

十年来，主要拉美国家的国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Gasparini、Cruces 和 Tornarolli，2011年；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3月号“财富分配”）。这在几十年公认的国民收入差距悬殊的典型国家——巴西体现得尤为明显。200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略高于60，如今则降至57以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基尼系数每降低1，都需要国民相对收入出现重大、迅速而独特的变化（见图2与图3）。墨西哥、阿根廷的国民收入差距也缩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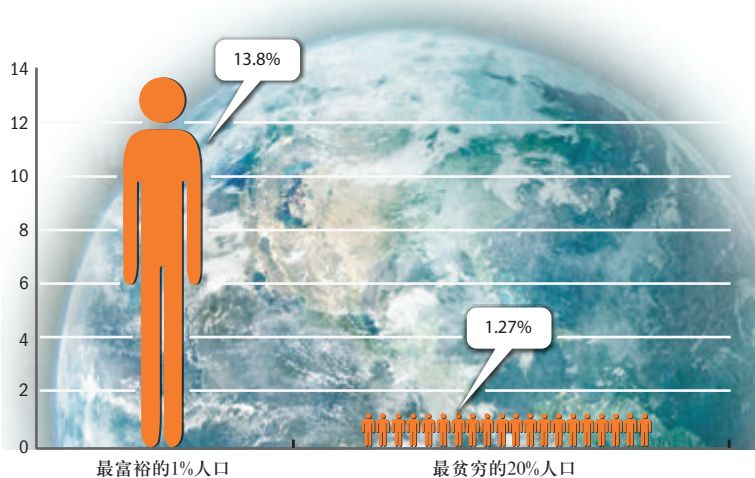
人们经常把上述进步归功于社会福利项目的实施，如墨西哥的“机会”项目和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这是以偏概全——这类社会福利资金占上述国家GDP的比重并不大（Soares等，2007年）。巴西的积极变化还得益于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以及高技能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但尽管如此，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仍居世界之首，巴西依然是世界上国民收入差距最悬殊的五个国家之一。

放眼全球

若在过去30年中，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拉大或维持相同水平，是否意味着全球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事

图3
如此巨大的差异

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14%，而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仅占1%。
(占全球总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图中为2005年的数据。

情并非如此简单。造成全球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还有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全球收入差距与各国人口、收入规模有关，例如中国对全球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卢森堡。在确定全球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时，我们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各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全球收入差距随之扩大；另一方面，较为贫困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实际收入的迅速增长，则起到缩小全球收入差距的作用。

通过各国的家庭调查，我们可得到计算全球收入差距所需的数据，此外，我们还需将各国收入换算成在全球具有相同购买力、能调合各国物价差异的“国际货币”，即所谓的“购买力平价美元”（\$PPP）。较贫困国家的物价水平通常低于富裕国家，而前者的国民收入若按购买力计算，则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水平。借助最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以及积累自各国的大量家庭数据，结合各国的购买力平价美元汇率加以计算，便可构建全球收入分配的模型，进而计算出全球的基尼系数。

缩小全球收入差距……这也体现了一种划时代的变革：数以百万计的人初尝经济繁荣的甜头。

1988—2005年，全球基尼系数每隔五年便会计算一次。通过计算，我们发现全球收入差距并未呈现某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但的确较为悬殊（见图3）——在70左右摆动。这一发现暗示着，（基于人口规模的）国家间趋同（中国、印度的经济正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刚刚能够抵消各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但2008年的初步数据——据其显示，新兴经济体当今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发达国家——却暗示全球收入差距有望缩小。

全球基尼系数似乎已从1990—2005年处于高位的70降至如今的67到68之间，但仍高于任何单个国家的水平，也高于50年或100年前的全球水平。但2008年可能出现的下行拐点——所谓全球收入差距将大幅缩小（或许言之尚早）——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如果该趋势能得以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自19世纪中期及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收入差距首次出现缩小。

因此，我们可将工业革命视作使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从此不断增加、其他国家徘徊在低收入阶段的一次“大爆炸”。但随着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迅速致富，全球人均收入有所上涨，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有些讽刺的是，这些积极变化却与全球金融危机同时发

生，但对收入、人口的简单计算却显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去耦合”有助于全球收入差距的缩小。

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各种表面现象迭出，经济学界所研究的并非都是“坏现象”。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但仍相对贫困的经济体保持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确有助于缩小全球收入差距，这也体现了一种划时代的变革：数以百万计的人初尝经济繁荣的甜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收入差距缩小或许比各国国民收入扩大更具政治意义。■

布兰科·米莱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世界银行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近期著有《富人与穷人：全球收入差距的特别简史》一书。

参考文献：

Burkhauser, Richard, Shuaizhang Feng, Stephen Jenkins, and Jeff Larrimore, 2009, “Recent Trends in Top Income Shares in the USA: Reconciling Estimates from March CPS and IRS Tax Return Dat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426 (Bonn, German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Gasparini, Leonardo, Guillermo Cruces, and Leopoldo Tornarolli, 2011, “Recent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Economía*, Vol. 11, No. 2, pp. 147-90.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Katz, 2008, *The Rac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Karabarbounis, Loukas, 2011, “One Dollar, One Vot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1, No. 553, pp. 621-51.

Levy, Frank, and Peter Temin, 2007, “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7/1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lanovic, Branko, forthcoming, “Global Inequality Recalculated and Updated: The Effect of New PPP Estimates on Global Inequality and 2005 Estim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 and Lire Ersado, forthcoming, “Reform and Inequa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An Analysis Using Pan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1990-2005,”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Long-Run View*, ed. by Gérard Roland (Houndmills,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8, *Growing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Piketty, Thomas, and Emmanuel Saez, 2006,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A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5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oares, Sergei, Rafael Guerreiro Osorio, Fábio Veras Soares, Marcelo Medeiros, and Eduardo Zepeda, 2007,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Brazil, Chile and Mexico: Impacts on Inequality,” IPC Working Paper No. 35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